

华夏文明的起源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所谓华夏，既非民族部落概念，又非宗族国家概念，也非朝代概念，而是一个民族概念。其所指乃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因此华夏文明就是华夏族的文明，亦即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

田昌五著



华夏文明的起源

田昌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夏文明的起源 / 田昌五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1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157-3

I. ①华… II. ①田…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30791号

华夏文明的起源

著者	田昌五
责任编辑	徐丽丽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11.75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0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57-3/K · 168
定 价	19.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探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的野蛮与文明

二历史学与考古学

三关于华夏文明

第二章华夏文明的前奏曲

一在混沌初开时的神话战争

二考古学提供的信息

第三章华夏文明的诞生

一在天地断裂中横空出世

二考古学的反馈

三华夏文明的诞生

第四章万邦并存唐虞兴

一关于尧舜禹的传说

二万国并存唐虞兴

三中国早期文明的再发现

第五章统一的华夏文明的形成

一夏文化的源流

二统一的华夏文化的形成

第一章探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问题

一中国古代的野蛮与文明

古代的野蛮并不是粗野，而是原始的意思。所谓野蛮社会，指的是原始社会，而文明社会则指继原始社会而来的阶级社会。原始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说，原始社会倒是颇为文明的，而阶级社会则是野蛮的。但是，只有到了阶级社会，才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社会分工，才谈得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从这种意义上说，阶级社会才真正是文明的。

当然，原始社会也有文化，例如打制石器、用火、制造渔猎工具等等，这都是文化。纺织缝纫、烧制陶器，这更是文化。原始人还有自己的宗教活动、绘画艺术等等。但是，原始社会在其发达时期也不过有两种生产：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还有一种生产，即精神生产，尽管有所萌芽，却是极度贫乏的。所以，原始社会就谈不到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之类的精神文明。有的人不明于此，将原始文化混同于文明，这是有违于马克思主义的。如然，野蛮与文明就没有什么界限，茹毛饮血也可以说是文明了。

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经过阶级社会到达高级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只有经过阶级社会才能到达高级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为，高级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有高度的物质文明的社会，而且是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的社会。这两者都是经过阶级社会创造出来的。所以说，阶级社会不管阶级压迫和剥削如何残酷，比起原始社会来说都是巨大的进步。没有阶级社会，就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懂得这条道理，用义愤推进科学，是不行的。

分清野蛮与文明的界限，是解决华夏文明起源问题的必要的前提。有规矩才能成方圆。没有规矩，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只是这里所说的规矩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和规定性而已，而科学的抽象和规定性是根据野蛮与文明的本质特征得出来的。我们不能随心所欲，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野蛮与文明的科学范畴。

但是，划清野蛮与文明的界限，是不是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呢？曰：未也。因为世界历史上的文明起源固然有其一般的特征和规律，但就每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还有各自的具体特点和规律。这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而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最后一章中，论述了古希腊人、罗马人和后来的德意志人的国家形成途径，它们就是各不相同的。古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其国家形成的途径尚且如此不同；华夏文明形成于欧洲古代之前，而且彼此之间缺乏任何相应的联系，就更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了。可惜，不少人将欧洲古代国家，甚至以古希腊国家形成的途径作为人类文明起源的共同规律，好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了。实际上，这种简易的贴标签的做法，不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也是毫不相干的。说不相干，就在于它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生命力。我们的问题，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找出华夏文明起源的具体途径和表现形态。搬用古希腊文明起源的途径和形成当然不能解决问题了。

这样说来，人类文明起源还有没有共同规律或者说共性呢？当然是有的。如果没有共同规律，历史科学也就无从谈起了。具体地说，各种社会分工，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以及与之相应的商品交换，就是文明起源所共有的。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更是文明起源所必不可少的。阶级是由分工产生的。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还谈什么文明呢？这些道理，我国二千多年以前的孟子就谈到过了，如：“子不善功易事，以羨补不足，则

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孟子·滕文公下》。又说：“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段话过去是作为反动言论批判的，其实孟子在这里说出了朴素的真理。一个人除吃的外，用的要由百工提供，如果都要自己干，只能引导社会走向贫困。这里讲的社会分工的道理，有什么不对呢？他还批评了布、帛长短相同一个价，麻缕、丝絮轻重相同一个价，五谷多少相同一个价，鞋子大小相同一个价，总之是不管品种和质量，只要是同类的东西就一个价，认为这会引起社会混乱的。至于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历史地看也是对的，何况他所讲的是尧舜时代那种理想政治呢！就是到了今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也只能从对立的关系改变为相互结合的关系，要消灭这种分工是进入高级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的事。人为地消灭这种分工，只会导致社会贫困和落后，是不可能走向共产主义的。

恩格斯在谈到文明起源时，正是从社会分工开始的。按他排列的程序：第一步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离出来，第二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第三步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由分工引起商品交换，产生了商业和商人，结果就出现了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必然产生贫富分化，产生阶级和国家。现在看来，这种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序未必确当，但作为社会分工的原理，是不能否定的。之所以说未必确当，是因为就现在已知的情况，世界上古老的文明都是从农业革命开始的，而农业和畜牧业的社会大分工多半存在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同时，游牧民族也不是不能进入文明社会的，尽管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其时间要晚一些。但是，农业与手工业之间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则是不可或缺的。所谓阶级是由分工产生的，实际上是说阶级也是一种社会分工。即：统治者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而被统治者则从事体力劳动。所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不过的形式，就是奴隶制。因为，奴隶不过是像牛马一样的生产器具，他们没有参与国家大事的任何权利，和脑力劳动是绝缘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讨文明起源问题时，都受到过傅立叶的影响。傅立叶认为，一夫一妻制和土地私有制，是文明时代的两大特征。他们就是据此探讨文明起源的。恩格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撰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其中的家庭即指现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也是一样。这三者是怎样起源的，文明也就是怎样起源的。傅立叶还认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包含着农奴制。所以，最早的家庭以缩影的形式包含着随之而来的阶级社会的一系列对抗。他说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就是据此提出来的。这就是说，只有妇女彻底摆脱掉屈辱和无权的地位，人类才能真正地从阶级对抗的狭谷中走出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早年还接受过一种传统的说法，即：氏族和部落是由家庭或家族发展而成的，后来他们把这二者颠倒了过来，认为家庭和家族是从氏族和部落发展而来的。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他们的某些具体论述未必恰当，但总的精神是无可非议的。例如，在社会分工不发达、土地私有制尚未出现以前就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和国家，这里的阶级是如何产生的呢？他们认为，这里的统治阶级是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转化而成的，转化的具体方式是分配不公，即阶级是由分配产生的。再如，在氏族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之间还存在过父系大家族，这也是后来才发现的。所以，他们的某些具体论述是可以讨论的，而从家庭入手探讨文明起源，研究最初的家庭形态，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上，现在的研究结果表明：文明社会几乎到处都是从父权家族开始的。我们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也必须抓住这个基本点，找出中国古代的家族形态、社会分工方式、阶级结构和国家形态；机械地搬运他们的论点，或者满足于否定他们的某些论点，都是不科学的。

从家族形态、社会分工、阶级结构和国家形态来看华夏文明的起源，我们就不难得出结

论：从家庭到宗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条脊梁。在氏族分解为家族，特别是母系家族转变为父系家族之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若干家庭构成一个家族，若干家族构成一个宗族。每个宗族都是一个国家，土地是归宗族国家所有的。如果有支同姓宗族，或多支异姓宗族的联盟，就会出现宗族国家联合体。灭亡了的宗族就会成为奴隶，至多是为人臣属。当然，奴隶也有零星俘虏来的，他们的命运更为悲惨，其地位低于族奴。奴隶有分属于家庭和家族的，但更多的则属于宗族，以宗室、公室、王室的形态而存在。这种奴隶制形态类似于西亚古代和古埃及的神庙奴隶制经济，是另一种发达的奴隶制形态。因为在其内部存在多种生产部门，尤其是各种手工业和牧业。政权和族权是合而为一的，宗主就是君主。职官地位低下，一般是君主的管家和管事。他们的职业是世袭的。这样，整个社会的分工就带有家族和宗族分工的特点。即拥有国家政权的宗族成为统治宗族，由其宗族的贵族执政；有的宗族则成为奴隶，或在宗室中从事奴隶劳动；而有的宗族或家族则世袭其职官，为人臣僚，亦即官僚或臣正。这些，就是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二历史学与考古学

历史学和考古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科。区别之一是：历史学科研究的通常是人类的文明史，有时则称为成文历史或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而文明史实即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恩格斯加注说明，这是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毛泽东则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4页。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就限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史，亦即文明社会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在欧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在中国则可追溯到古史的传说时代。再往上溯，就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了。有时我们也称文明社会出现以前的历史为史前史，即成文历史以前的历史，但这种说法比较笼统，难以成为定论。

考古学不仅要对文明社会的历史遗迹、遗物和各种历史遗存进行研究，而且要对史前的人类文化进行研究，包括人类起源和形成的历史。不过，这段漫长的历史严格说来应属于人类学的范畴，至多不过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即：人类起源与形成阶段和原始社会阶段而已。这段时间大约有三百万年，远远超出人类的文明史。从这种意义上说，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远远超出历史学的。

当然，这不是说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就没有历史可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0页。各种自然科学属于自然史，各种社会科学属于人类史。可以说，这是广义上的历史科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作为历史学科，就不能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它只能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历史学科也研究文明社会出现以前的人类史，不过不是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研究，而是作为从猿到人的进化史来研究的。这不是说那时没有人类社会，有了人类就应该有人类社会，但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人们的社会较之猿类也不会有太大的实质性的差别。以往我们称此种社会为“原始群”，并不怎么确切，因为它不能表明那时的人类社会的特征。依我看，那时的社会实应取名为类猿社会。这就是说，那时的人类社会和猿类社会有相似之处，而和后来的人类社会是有根本性的差别的。人类从猿类中分离出来，其社会就不能不带有猿类社会的特征，就是在人类有意识地从自然界谋取生活资料之后，他（她）们也不会立即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所以，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人类社会只能是类猿社会。他（她）们和猿类的区别只在于能制造工具，利用自己的工具谋取生活资料，因而在体质上同其他猿类有本质区别。

人类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即不同于任何动物社会的社会，是在进入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所谓史前史，也不过是就此而言的。原始社会是以财

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公有制的基本单位是氏族，所以也称氏族社会。文明社会是在氏族解体为家族后形成的，因而氏族社会的历史就构成文明史的前史。

就文明社会以前的人类社会而言，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远远超出历史学的，但就人类社会真正形成以后的历史而言，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又是狭窄的。因为，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的物质文化；而在我国，考古学又被规定为器物形态学和地层学，其局限性就更大了。所谓器物形态，实际上是就陶器而言的，或者说主要是指陶器；而地层学充其量也不过是文化年代学罢了。器物形态当然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风貌，但却很难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各种社会的内部结构。何况，同一类社会形态，例如氏族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是会有不同的器物形态和物质文化风貌的。

相对而言，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就宽广得多了。因为历史学研究的是人们的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形态，是各种社会形态的演变和递嬗的过程。所以，历史学是可以包含考古学的内容的，而考古学则不能涵盖历史学。这就是考古学在涉及到社会历史问题时容易出现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原因。要避免这种现象，只有将考古学归属于历史学，将考古文化归结为一定社会集团的文化。这样，物质文化就同样是由人创造的文化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自然是要创造自己的历史文化的。我们应当将物归其主，归属于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这样，考古学的科学性才有保证，才能成为科学的考古学，而获得其应有的生命力。

明白了这一点，对解决文明起源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迄今为止，考古学对文明起源的标准大都是就物质文化提出来的，很少涉及到社会结构的演进。例如，有的偏重于文字和成文历史的出现，有的则以文字、金属器和城市三者的出现为标准。这些，看起来是相当科学的，但实际上却是很难把握的。拿文字来说，这当然是人类的一大创造，可是真正发明文字的民族却屈指可数，大多数民族的文字是借助于其先行者的文字创制的。而且，有了文字，不见得很快就有成文历史。成文历史往往是在文字被发明出来以后很久才出现的。再说，世界上有不少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仍然是没有文字的。如此等等，我们怎能以文字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准呢？铜器和文明起源也有错前错后的情况。即有了铜器，甚至青铜器，而尚未进入文明社会，或者进入文明社会而尚无铜器。而且，有的民族是伴随铁器的出现进入文明社会的。如拘泥于这一点，问题就更难解决了。当然，文明社会和铜器是相应地先后产生的，但要对号入座就困难了。何况，青铜可作锋利的工具和武器，而不能完全排挤掉石器呢！至于说到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一般说来，最早出现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但有城市并不见得就一定有国家，早期国家也不是都有城市的。所以，文明起源问题必须由历史学来解决，而且只有历史学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其标准就是父权家族的出现。而在中国古代，不止有家族，还有宗族。只要是发现了这种宗族社会集团，不管其有无文字、铜器和城市，它已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了。

人类社会诞生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以血缘集团存在的。这种集团的发展次第大体为：原生血缘集团，其内部关系和高级类人猿如黑猩猩，是比较接近的；接着是亚血缘集团，其内部当已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配关系，氏族大概是在这时期开始形成的；再次是氏族集团，其内部不仅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配关系，而且应已排除了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最后是在氏族内部分解为家族集团，进而每个家族再分解为若干家庭，从而转入文明社会。氏族和家族多半为母系，但也不排除有父系的，而家族分解为家庭之后，或者说由家庭组成的家族，一般则是父系的。当然也有例外，有的氏族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仍然保持母系家族。不过，在家族分解为家庭之后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则是文明起源时的共同现象。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特点，只在于家族还组成为宗族而已。

最后再说一下，人类文明起源有其共同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的文明起源的两种途径，是在他没有发现家族之前说的。按他和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理解：最初是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专制君主三位一体，后来他们发现了农村公社之前存在过氏族公社，但

还不知道二者之间是有家族的。所以，他在论述西方文明起源时，是从氏族分解为家庭开始的。而对东方文明起源，则认为是从氏族公社转变为农村公社之后开始的。故而将其设想为农村公社之间的冲突和联合，需要扩大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转变为统治者，奴役众多的村社成员。但最后他不仅发现西方古代存在过大家族和父权家族，东方也不例外。这样，从父权家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共同规律了。

三关于华夏文明

在探讨华夏文明起源问题时，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即何为华夏文明？这个问题好像是不言自明，用不着讨论。实则不然。当前讨论中的不少分歧意见，有一些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例如，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呢？如不弄清什么是华夏文明，这类分歧就是无法解决的。

要确定华夏文明的含义，首先应明确“华夏”一词的含义。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所谓华夏，既非民族部落概念，又非宗族国家概念，也非朝代概念，它是一个民族概念。其所指乃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华夏文明就是华夏族的文明，亦即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

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说来，民族这种社会共同体是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氏族，由氏族结合成部落，是氏族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超出部落的社会结构就开始向民族转变了。这当然不是说，部落制完全解体之后才能形成为民族，历史上有不少民族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仍然保留着部落制。不过，这样的民族共同体是超越其部落界限的。它们不是部落共同体，而是保留着部落社会结构的民族共同体。因为，这种部落已不是由氏族所构成，而是由家庭和家族构成的。它们相互之间也不是彼此互异的共同体，而是具有民族共性的部落体制了。

这种情况说明，民族不是在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开初它总要保留着部落制的外壳，以非亲族地区性部落联盟的形式而出现。所谓非亲族地区性部落联盟，即中国古代的异姓同盟。这种异姓同盟，有些在渊源上是有亲族关系的，有些则从无血统上的关系；它们，特别是后者，就是最初的民族形态。作为民族，在血统上都是杂种，纯种的民族是很少有的。因为，只有血统上互异的部落结成的联盟，最后才能摆脱部落制的外壳，形成民族共同体。

华夏族的形成也走着同一途径。例如，夏族是由姒姓、允姓等古羌人和一部分颛顼族的苗裔构成的，而颛顼部主要来自夷人。商族是由夷人的一支和有戎氏构成的。周族是由姬姓之戎和羌人构成的。如此等等，很少例外。可以说，华夏族就是这样形成的。古代的所谓万国，也不过是部落万余。由万国而三千余国，由三千余国而千余国，由千余国而十余国，由十余国而大一统。无数次的友好结盟，无数次的武力兼并，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民族，这就是华夏族。

华夏族形成于中原地区，但并非完全是由原居于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演化而成的。在华夏族形成的过程中，有原居于中原地区的民族部落迁往四方的，也有居于四方的氏族部落迁入中原的。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形成华夏族，就在于它是五方杂处之地。各方的氏族部落在此汇合，不能不发生接触，不能不发生冲突，不能不发生交往，结果就形成了华夏族。把华夏族的形成过程说得纯粹又纯粹是完全错误的。如然，汇进华夏族的氏族部落就只能停留在血缘亲族集团的阶段，至多是停留在亲族集团联盟的阶段，那也就没有后来的华夏族了。

正因为如此，在汇入华夏族的氏族部落中，其亲族和苗裔有居于四方的，有迁往四方的。同为禹父鲧的后裔而有瓜州之戎，其衣服言语不与华同。同为夏后氏的后裔，在中原者为华夏族，迁往北方者则为匈奴。故史公曰：“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同为帝颛顼的后裔，其在中原者为华夏，迁往南方者则为荆蛮。同为黄帝的子孙而有华夏和戎狄。其为华夏者自不用说，其为戎狄者则犬戎、赤狄、白狄，均其明证也。同为炎帝之后而有华夏和氐、羌，这就更不用说了。直到春秋时期，在华夏族中还有不少姜姓之国，它们明显是出自羌人的。太皋氏、少皋氏、帝鸿氏、缙云氏、共工氏等的后裔，都是这样，有进入华夏的，有成为蛮夷

戎狄的。有华夏之后而有蛮夷戎狄，然而华夏却是由蛮夷戎狄荟萃而成的。因此，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它们各自相互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息息相通的，又是夷狄而中国，中国而夷狄，能以相互转化的。

由此可以说，华夏族是由多元形成的共同体，而在它形成之后又是一干多枝的民族谱系。蛮夷戎狄和华夏之间都是交错而生的连理枝。这里边，不仅包括蒙古人种的各个分支，而且有西来的印欧人、阿拉伯人、尼格罗人，南来的马来人，等等。中国文化西来说是不对的，但这并不排除中华民族中有西来的民族成分，中国文化中有外来的文化。简言之，多元一体，一干多枝，这就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多元一体是就华夏族的形成而言的，一干多枝指的是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所以，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可以统称为华族，而华族又是分为许多民族的。

至于华夏族是何时形成的，我认为应定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到这时候才真正形成了与蛮夷戎狄有别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原来出自不同的所谓古帝王的氏族和部落到这时都合而为一了。原始时代的氏族部落是有族姓的，所以有的人又称氏族为姓族。这样的姓族在古代是屈指可数的，所以从族姓上很容易区分不同的氏族和部落。由姓族繁衍为宗族，再用族姓就不行了，因为许多宗族都是出自同一姓族的。为了区别不同的宗族，于是而有宗氏，即宗族的名称。在通常的社会交往中，人们是称氏不称姓的。称氏不称姓，表明氏族部落制在逐渐消失。不过，在追述宗族的渊源时，人们又把族姓提出来。这又表明，氏族部落制还没有完全消失。进入春秋战国，人们以氏为姓，姓氏不分，宗族离散，再也找不到氏族部落的痕迹了。这就意味着华夏民族的形成。当然，古老的族姓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它已不是氏族部落的专称，而是华夏族中的氏姓了。

由多元而一体，就发生了祖宗牌位如何安排的问题。开始人们是把华夏族的祖先并列提出来摆上祭坛的，如太皋氏、少皋氏、共工氏、烈山氏、缙云氏、轩辕氏，等等。在阴阳五行学说问世之后，又从众多的祖宗中选出五位来为五帝。五帝之说不一：一种安排是太皋、少皋、黄帝、炎帝和颛顼。另一种安排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由于前一种安排是多元的，缺乏先后继承关系故此消亡；后一种安排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保留下来了。但后一种安排也有问题，其他祖宗牌位往哪里摆呢？为此而有三皇，而三皇之说也是各不相同的。一说是天皇、地皇和人皇，可是这三皇又是怎么生出来的呢？为此又请出一位盘古来，是他开天辟地，让中华民族生下来的。这类神话传说，名目繁多，问题百出，难以尽述。但其实质只有一个，即都是按照华夏族形成之后的民族共同体推衍出来的。我们不能说这些神话传说全无根据，但其体系是由后人编制的。要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打破这种神话传说的体系，归纯返朴，还其本来面貌。这样，我们才能查明华夏文明的源头，看它是怎样从多元演化成一体的。

对考古学也应这样说。我们不应按照后人编制的华夏文明起源的帝王世系来安排考古资料，而应按照考古资料的本来面貌看华夏文明是怎样从多元汇为一体的。或者说，在后来的华夏地区内，考古文化是怎样从多种文化系统汇合为一种文化的。

我们相信，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指导下，将历史与考古互相参证与结合，就一定能够将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过程理出一个大致的线索。

第二章华夏文明的前奏曲

一在混沌初开时的神话战争

在人类文明起源的前史上，往往有一些战争的神话和传说，由这些神话般的战争拉开文明的序幕。究其原因，恐怕是氏族部落开始裂变并聚合为民族时所产生的。在原始社会中，部落以外的就是法律以外的，所以部落之间的纠纷通常要用武力来解决。通过连绵的战争形成的部落群体，就是原始的民族。这种现象在原始社会的早期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时的氏族部落之间隔着广阔的森林草原地带，人们的活动一般又不超出自己的生存空间，相互之间的交往更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氏族部落的数量不断增加，交往日益增多，迁徙频繁发生，这就必然要发生冲突和战争，有时还是你死我活的极其残酷的战争。特别是在异姓氏族部落之间，双方都认为对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相互视为禽兽的。视同禽兽，自然要采取对付禽兽的手段了。所以，说原始社会是通过和平的途径转变为文明社会的，并不完全正确。就氏族部落演变为民族来说，这次社会形态的更迭同样是由暴力来实现的。由于原始的氏族部落各有其宗神，又多以鸟兽虫鱼来命名，所以这类战争一般都以禽兽鬼神之战流传下来，成为奇异怪诞的神话传说。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前史上，也有惊天动地的神话战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循环式战争。据《逸周书·尝麦》的记载：

昔天之初，口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皋，以临四方，司口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命之曰绝轡之野。乃命少皋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这段神话的意思是：在天地形成之后，上帝立了两个王，即所谓“二后”。古代后与王义同，故可通用。这两个王就是赤帝和蚩尤。上帝还颁下命令，分别规定了赤帝和蚩尤的职务。但是，蚩尤却不守职命，攻起赤帝来了。双方战于涿鹿之阿，打得赤帝“九隅无遗”。赤帝惶恐万状，请求黄帝支援。黄帝擒杀蚩尤。随后仍请少皋出来正定人间秩序。黄帝战蚩尤

在这段神话故事中，出面的有四位人神：赤帝、蚩尤、少皋、黄帝。《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谈到这段故事，但略去了赤帝和少皋，多出了另外几位人神。其文如下：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

这两则神话中都说蚩尤被杀掉了，其地点或云在冀州之野，或云在凶黎之谷。但有一部纬书《龙鱼河图》中则说，蚩尤没有被杀而是由黄帝降伏了，而且说得也更加怪诞，令人难以置信。请看：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

由于传说蚩尤被黄帝擒杀了，所以就有蚩尤之墓。据魏人王象、缪褒等所撰《皇览》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阙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阙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钜野县至今犹存，属菏泽地区。寿张县已并入阳谷，现属聊

城地区，但古寿张也许在今之东平县西北。当然，所谓蚩尤冢，早已不知去向了。

由于传说蚩尤未死，还受黄帝之命主持军事，所以他就参加了黄帝的盟会。据《韩非子·十过》中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太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蚩尤在这里又出现了。不仅蚩尤，还有他的风伯和雨师。这是一次部落大会，禽兽鬼神都参加了。大会地点在西太山，即今山西霍县一带的霍太山。这次大会留给后人的传说有风后陵，风后陵简称风陵，在今黄河禹门口东边。这次大会反映出，蚩尤、赤帝、黄帝之间的反复战争，终于以和平的结盟而告一段落，只是盟主为黄帝而已。

不过，赤帝不在其列，他到哪里去了呢？赤帝即炎帝，原来他在求助于黄帝打败蚩尤之后，又和黄帝打起来了。这次大战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最详，录之于下，再加评说：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从这段材料看，黄帝是同蚩尤和炎帝分别进行战争的，而且黄炎之战在前，黄帝与蚩尤之战在后，亦即黄帝先打败炎帝而后又联合炎帝打败蚩尤的。这种安排很可能是受了周人的影响，因为周人自称出自天鼋，亦即轩辕氏；而且黄帝与炎帝是同胞兄弟，怎能互相厮杀呢？不错，周人的黄帝确实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同羌人的炎帝结为联盟而起家的，但这并不排除其他地区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有相互攻伐的事实。在上述黄炎之战中，黄帝出动了熊、罴、貔、貅、虎六个部落，它们就见于周人的记载。而且，这次大战发生在阪泉之野，阪泉是不在西北黄土高原的。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里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案：阪泉之野则平野之地也。”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不是无迹可寻的。春秋时，晋文公出师勤王，令狐偃卜之，“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左传》僖公廿五年，以为吉炎帝神农氏利。这里说的就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

蚩尤和炎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都不在西北黄土高原。其地一云在涿鹿，已如上述。汉代上谷郡有涿鹿县，或云即此处也。另一种说法是在冀州之野。古冀州包括西河之东，即今山西的黄河；南河之北，即今三门峡至郑州的黄河；东河之西，即自今郑州西北折而东北流的古黄河。冀州之野只能在这里而不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上。涿鹿之阿当然也在这个地区之内。阿的意思为山麓，这块地方有中条山、太行山，迤北为燕山山脉。所以涿鹿之阿即使不在上述之涿鹿，也应在太行山的东侧，至多是不会超出中条山的。

为什么同一神话传说而诸说不同？其原因恐怕是：年代久远，记忆依稀，难得考实；传闻互异，各述所记，所闻不同，所记亦异；人神之间，漫无边际，禽兽鬼神，浑然一体；后人加工，取舍不同，各取所需，编成体系。所以，三皇五帝的系统从来都是说不清的。太史公博闻广记，也感到要写《五帝本纪》是有困难的。为此，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史记》精装本第一册第46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太史公说来说去，也只能以《五帝德》、《帝系姓》为依据，兼采他说，著为《五帝本纪》。但他哪里知道，所谓《五帝德》是按五德终始说（金、木、水、火、土）编制出来的。故一个模式而诸家不同，如《吕氏春秋》中就以太皋、少皋、黄帝、炎帝、颛顼为五帝。张守节《史记正义》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皋、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史记》精装本第一册第1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诸如此类，不作备举。要之，所谓三皇五帝，都是后人按照自己的时代思维模式，即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安排出来的。实际上，在所谓“万国”时代之前，根本无所谓五帝，也无所谓三皇。所以，我们在考察这段历史的时候，必须打破这种陈旧的历史体系，才有可能还其本来面貌。而所谓三皇五帝，也均非实有其人。他们要么是氏族部落称号，要么是氏族部落之神。而同名共神的氏族部落又是屡见不鲜的。这是一个神人不分、人自称草木禽兽虫鱼的时代，是不能完全以文明史视之的。要揭开这段混沌状态的历史之谜，必须把隐含在鬼神禽兽中的氏族部落找出来，从而清理出华夏文明起源的端绪。

上述传说涉及到的神话人物主要有：蚩尤、炎帝、少皋和黄帝，而据《盐铁论·结和篇》：“轩辕战涿鹿，杀二蚩尤而为帝”。这二指的就是太皋和少皋。所以，在上述神话人物中还应包括太皋。现依次从史籍勾勒如下：

皋亦作皞、洁、昊等，皆同音通用，其义为太阳经天而行，所以太皋就是太阳，即太阳神也。这是一种信奉太阳神的氏族部落，其发源地在淮水中上游。“陈，太皋之虚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地在今河南淮阳。后世这里有太皋陵，并建太皋庙，定期举行祭祀和庆祝活动。届时商贾云集，热闹非凡。这也可以说是由太皋氏演化来的传统文化吧！

但是，太皋的后裔可考者却比较渺茫。据说，太皋风姓，神话中的风后和风伯应与之有关，不过他们都不是社会实体。作为社会实体的只有：“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皋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据杜预注：“任，今任城县也”，在今山东济宁市境。“宿，小国，东平无盐县也”；“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均在今东平县境。“颛臾在泰山南武阳东北”，今费县境内。此外有点线索的可能是颛顼。《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豁，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孺与乳通用，义为抚育成长。《帝王世纪》云：“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与此相符。东海指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东海之外就是巨野以东了。这里要指出一点，即炎、黄、蚩尤之战以后，太皋各部可能受到攻击而从淮水中上游向东北退走，托庇于少皋各部，故而有“命少皋清正司马鸟师”之说。

蚩尤可能与太皋有关系。“太皋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蚩尤之“尤”字实为蛇之象形，而蚩字下部又作虫。古代龙蛇难分，故蚩龙亦可释为龙蛇，正如九字为龙之象形一样。至于将太皋说成东方苍龙，把蚩尤说成带尾巴的彗星，那是战国以后的事。当然，把蚩尤说成像彗星而后曲的旗帜，并无多少恶意，只不过说明此星如出现就要发生兼并战争而已。正如《管子·地数篇》中所说：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可见，蚩尤是一位战神，蚩尤旗是一面战旗。难怪古籍中说“蚩尤作兵”或“蚩尤作五兵”，把他说成兵器发明家了。

可是，蚩尤的后裔却比较难寻，这大概是因为他战败了的缘故。《大戴礼·用兵篇》中说：“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实属荒唐。庶人怎能与赤帝和黄帝大战呢？东汉末的应劭说他是“古天子”和《逸周书·尝麦篇》中说的“命蚩尤于宇（宅）少皋”相接近。但这和说他是庶人一样，不知属于何族？《尚书·吕刑篇》中有这样两句话：“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苗民”和“苗民复九黎之德”。不少汉代学者可能据此说蚩尤是“九黎之君长”，这才有一点线索。《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国，《史记·周本纪》作“耆”，《宋微子世家》作“”，当是九黎。字的

“弌”旁是附加的，去掉后即是九。九在这里并不是数目字，而是族邦名，故可单称或黎。春秋时仍有黎国，曾为赤狄潞氏所灭，晋灭潞而复立之，可能是九黎之后。其地在今山西黎城、潞城、长治、壶关一带。另外，汉之魏郡有黎阳，在今河南浚县境；东郡有黎县，在今山东郓城县西，这些地名也可能由九黎而来。如然，蚩尤就是古代活动于今鲁西、豫北直到山西东南的氏族部落群之代称了。蚩尤各部活动在这些地方，向北发展，和黄帝战于涿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蚩尤和少皞的关系是清楚的，不过少皞似乎没有和黄、炎二帝交过锋。少皞即小皞，同太皞一样也是太阳神，只是大小有别而已。由此可见他和太皞的关系。少皞的所在地，据周初大分封时鲁公伯禽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帝王世纪》也说：“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来看，应在今之山东曲阜以南，故后人有少皞都于曲阜之说。今曲阜市有少皞陵，表明少皞在这一带活动过。当然，奉少皞为祖神的氏族部落群，其活动地区是不会限于曲阜的。春秋时有一位邾国之君说少皞是他的祖先。当有人问道：“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他说：“吾祖也，我知之。”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地，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命以民事。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鸤鸠氏，司事也。五鸠，鸤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这些鸟有的可得而言，如玄鸟即燕鸟，伯赵为伯劳鸟等；有些则不知为何鸟，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它们都是氏族部落的名称。就连少皞名挚，也与鸟有关。挚、质、鷩同音通用，而鷩是鹰一类的猛禽。这个庞大的氏族部落群的活动范围是很广的，如“昔爽鸠氏始居此地”，指的是后来的齐国；而自称少皞之后的邾国，则在今山东邾城境。可以说，广大海岱地区都是少皞氏生栖的地方。

少皞氏的后裔可考者有皋陶和伯益。据说皋陶，偃姓。偃同匱通燕，当是以燕鸟为名的氏族部落群，和少皞氏以鸟名官是一致的。相传“皋陶生于曲阜”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这和少皞都于曲阜也是符合的。就连他的名字中之皋和少皞也是相通的。因此，皋陶应属少皞系统。但皋陶的后裔却不在海岱地区而在江淮之间，如春秋时期还存在的英、六、蓼和群舒（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大体在今安徽六安、舒城一带。它们都是奉皋陶为祖的。所以当楚国灭六和蓼的时候，鲁国的臧文仲感叹道：“皋陶、坚庭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左传》文公五年。意思是说，六和蓼内不修德，外不结援，以致灭亡，皋陶和坚庭的香火一下子就断绝了。这些国家又被称为淮夷。《诗经·鲁颂·泮水》也将它们和皋陶联系起来，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慎如皋陶，在泮献囚。”这是一首歌颂鲁僖公征伐淮夷的诗，文中提到皋陶，可见皋陶和淮夷是有关系的。其实，所谓群舒中之舒鸠也就是爽鸠氏。

伯益又作伯翳，据说他是皋陶之子，但皋陶匱姓，伯益嬴姓，似不可通。实则嬴和匱不过一音之转，如娥皇、女莹可以作娥皇、女匱或女英。伯益初居何地，不明，但其后裔散布很广，颇有影响。据太史公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邾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以及赵氏《史记·秦本纪》。其中可考者如徐国，在今苏北到鲁南，曾称霸东方。邾氏即邾国。莒氏乃莒国，在今山东莒县一带。终黎氏，《世本》作钟离，在今安徽凤阳境。运奄氏可能就是商代的奄国，在今山东滕县一带。菟裘氏，不详。将梁氏即梁国，初在今河南开封，后迁汝阳，再迁至今陕西韩城一带。黄氏即黄国，在今河南潢川境。江国在今河南正阳境。修鱼氏，不详。白冥氏可能就是伯明氏，如然，当在今山东潍坊地区。蜚廉氏即费氏，初在今山东费县，后西迁。秦、赵都出自费氏。另有嬴姓之葛国，为商汤所灭，在今河南宁陵。可见，这

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氏族部落群。难怪历史上有伯益和禹子启争位的传说了。值得一提的是，伯益应为少皋之后，有前述郯子认祖之言可证，而且有说少皋为嬴姓者。但史公却说他是颛顼之后，而近年在凤翔发掘的秦景公墓中出土器物铭文中有“高阳有灵”之句，高阳即帝颛顼。这究竟是“帝少皋孺帝颛顼于此”的结果呢？抑或是伯益部后来投靠了颛顼部呢？

此是后话，暂且不提，还是说蚩尤的对手炎帝吧！古赤、炎不分，故赤帝即炎帝。蚩尤宇（宅）于少皋，处于东方，炎帝自然是在西方的。按周人的传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国语·晋语》四。这段传说回避了黄、炎之战的问题，显然是根据周人和羌人的联盟关系编出来的。

不过，这段传说中提到的炎帝还是比较可靠的。《水经注》渭水条下说：“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岐水发源于岐山（今扩箭岭），其下游古称姜水，折南流入渭水。这一带有关姜姓炎帝的遗迹甚多，如姜氏城、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姜原等等。徐旭生先生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42页，是颇具见地的。

炎帝也好，赤帝也好，均非实有其人，而是崇拜火的氏族部落神。故而有“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之说，也有直接称炎帝为火师的。这个崇拜火的氏族部落群就是羌人或氐羌。姜与羌是相通的，故姜姓即羌人。只是后来留在西部并向西发展者为氐羌，向东发展进入中原者为华夏罢了。它们之中可数者有：

烈山氏。据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国语·鲁语》上。“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左传》昭公廿九年。《礼记·祭法》的记载类此，唯烈山氏作厉山氏。郑氏注云：“厉山氏，炎帝也，或曰有烈山氏。”后人所说的炎帝神农氏实即这位烈山氏。春秋有一厉国，姜姓，可能是烈山氏的后裔。其事见僖公十五年：“齐师、曹师伐厉。”陈槃先生云：“厉，姜姓，神农厉山氏后。今湖北随县北四十里有厉山，山下有厉乡。”《中国历史地理·春秋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当然，作为一个氏族部落群，其活动范围是不会限于此地的。要不，今湖北西部为什么还有神农架的地名呢？

其次是共工氏，或称炎帝共工氏。不过“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国语·周语》下。这是有别于炎帝之以火纪的。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可能与共工氏治水有关系。据说共工氏就是由于治水失当而灭亡的。“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国语·周语》下。韦昭注引贾侍中云：“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这是一支庞大的氏族部落群体，曾称霸于九州。故而有这样的传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国语·鲁语》上。或者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礼记·祭法》。所谓“九州”、“九有”，实乃共工氏的九个氏族部落。其活动地域约略可寻，“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左传》昭公四年。说的是共工氏活动过的地方。这块地方是以今之洛阳盆地为中心而展开的。在今之晋南和豫西，商代有九侯，周代有九州之戎，可能都是共工氏的后裔。共工氏虽然很早就灭亡了，但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禹贡》所谓九州，就是按照共工氏之九州放大出来的。这也许是“禹代共工”或“逐共工”而据有其地的缘故吧《荀子·议兵》、《成相》、《战国策·秦策》、《山海经·海外北经》等。！

和共工有关系的是四岳，他们被称为共工氏之从孙。四岳的首领为伯夷，据说他当过秩宗，是位祭山的官，实际上是位山神。四岳的后裔可数者有齐、吕、申、许。《诗·大雅·嵩高》有云：“嵩高唯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其中嵩为嵩山，后称中岳，甫即

吕也。据说四岳曾佐禹治水，“皇天嘉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所以说“齐、许、申、吕由太姜”《国语·周语》中。而生也。这四个国家中的申、吕、许，开始大概都在中岳嵩山一带，只有齐在渭水上游。后来申、吕迁于南方，如《国语·郑语》中所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许由中岳东迁至今之许昌，再迁至今之叶县，最后迁到淅川，也到南方去了。而齐国的姜太公吕尚则受封到了东方。齐初在西方而尊伯夷是不足为奇的。“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苗龙，苗龙是生氐羌。”《山海经·大荒西经》。它和氐羌原本是同一族类。

齐国受封到东方是后来的事，在此以前很久就有一支羌人到那里去了。据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传》昭公廿年。这里的爽鸠氏属少皞系统。季荊，相传为虞、夏诸侯，不详其族类。蒲姑氏是商代的东方强国，曾参与武庚（纣王子）和管蔡的叛乱，为周公所灭。在季荊和蒲姑之间就是有逢伯陵了。这位有逢伯陵为炎帝之后，姜姓。周人在谈到东方的婺女星时说：“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国语·周语》下。韦昭注云：“伯陵，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山海经·海内经》中则径称之为“炎帝之孙伯陵”。从有关材料推断，这支羌人在商代之前已经到了齐地了。春秋时这里的纪、向、州、谭等姜姓国家可能就是这支羌人的后裔。

在共工氏活动地区之北，依稀可考者还有缙云氏。“缙云氏有不才子”《左传》文公十八年。曰饗餐，被帝舜赶跑了。《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贾逵云：“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这支羌人的发展线索不太清楚，只有《吕氏春秋·恃君》说“饗餐、穷奇之地”在“雁门之北”，也许他们被驱逐到那里去了吧！

最后再谈一下黄帝。如前所说，黄、炎、蚩尤之间的战争都是在北方今之冀北发生的，而古冀州大体上也在今之晋、冀两省范围内；黄帝“大合鬼神”在今之霍泰山，而非东岳泰山。就连传说中的黄帝陵也不在今之黄陵县。相传黄帝葬于桥山，其地据宋以前的史籍，均以为在汉代之上郡阳周县。如《皇览》云：“黄帝冢在上郡桥山。”《汉书·地理志》上郡阳周县条下注云：“桥山在南，有黄帝冢。”《括地志》说：“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阳周县到隋代改为罗川县，故二者实为一地。此地约当今陕北子长县境。黄帝驯养来进行战争的六种野兽（熊、罴、貔、貅、虎）也多为北方之物，而黄帝为有熊氏。按太史公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史记·五帝本纪》，带有游牧部落的特色。凡此种种，都说明黄帝乃是北方的一个庞大的氏族部落群。其后来的发展有类于炎帝的后裔，只是南下入中原者为华夏，散处北方者仍为戎狄而已。据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国语·晋语》四。且不说这段材料中的矛盾之处，姑就十二姓而言，姬姓之中到春秋时仍有戎狄，如骊山之戎，姬姓；狐戎，姬姓等等。酉姓即姓，只发现于白狄。如白狄中之鲜虞、鼓、肥等国，均为姓。任姓源于有仍氏，而有仍氏和有戎氏是相通的。另据《山海经·大荒西经》：“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此北狄。”《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这两支犬戎，一支就是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的犬戎，原在今之陕北，后迁今之甘肃天水；另一支就是后来被晋国赵襄子灭掉的代国，在今山西代县。这其中的详情除十二姓中之不可考者外，留待后面再说。

黄帝之所以被儒家列为五帝之首，首先是出了祁姓之陶唐氏，其次更重要的是姬姓的周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王国。黄帝也就因此膨胀起来了。由于周人兴起于西北黄土高原，黄帝也就到了那里。其实，我国北方民族向西发展进入西北黄土高原者历代有之，周人和姞姓之

密须（今甘肃灵台）最初不过是活动到西北之戎狄而已。到了西北黄土高原，和羌人结为联盟，黄帝和炎帝也就成了兄弟了。但“我周人出自天鼋”《国语·周语》，“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左传》昭公十九年。, 这和炎帝之以火纪，仍然是有别的。

综上所述，黄、炎、蚩尤之战大致上涉及以下三个或四个集团：一是太皋、少皋和蚩尤集团，二是炎帝集团，三是黄帝集团。如果细分，少皋集团还可以单列。这几个集团在《易经传》中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出场的是庖羲氏；他是始作八卦的人物。古代常把他和太皋氏合为一人，称太皋伏羲氏。其次出场的是神农氏，他是一位作耒耜教民稼穡的人物，同时也进行交易。如前所述，他就是炎帝神农氏。最后出场的是黄帝和尧、舜，他们的发明和功绩就多得多了。如衣裳、舟楫、弓矢、杆臼、棺椁、书契、服牛乘马等等，这些发明都是从黄帝开始的。

在这里没有蚩尤的位置，因为他早被视为凶神而另行发配了。少皋氏也没有位置，大概是因为没有继承正统的缘故。在古代传说中，帝尧的老兄名帝挚而又未登位，看来就是少皋挚了。不过，上述安排多少还是反映出了炎、黄、蚩尤之间的关系。

二考古学提供的信息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所谓黄、炎、蚩尤之战，在考古学中有没有一点信息可寻呢？我看多少有一点。当然，要把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直接挂钩是有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但神话传说绝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不管它有多么离奇怪诞，它总是以一定人群的活动为根据的，而人们的活动总要留下遗迹来。所以，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必然存在着某种隐隐约约的对应关系。我们不能因为“查无此人”而根本否定这种关系，而应在考古资料中找到它的原籍。有趣的是，当我们做这种努力的时候，一种古老的考古文化很自然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它就是磁山——裴李岗文化，有时人们也分别称之为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

裴李岗文化以首先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而得名。现已查明的分布范围，南达潢川、固始，北达林县，东至项城、商水，西至卢氏，其中心在豫中地区，西南及于方城，东北影响及于山东滕县。

磁山文化以首先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而得名，因其与裴李岗文化大同小异，故而可以合为一种考古文化。这样，豫北如林县、孟县等地发现的裴李岗文化亦可归入磁山文化。磁山文化沿太行山东侧达于冀南或可至冀中，向东伸展到哪里目前尚不清楚，也许能到冀、鲁、豫交界地区吧！

从时间上说，裴李岗文化上限早于磁山文化。综合碳14测定的有关数据，裴李岗文化存在于公元前六千年到五千年，延续了大约一千多年，距今七八千年，或者更早一些。磁山文化的年代，下限大约与裴李岗文化同时而略早；上限为公元前五千四百年，较裴李岗文化的上限晚约五百多年。据此似乎可以认为，磁山文化是裴李岗文化由南向北发展的产物；或者说，磁山文化是裴李岗文化的一个地区类型。

裴李岗文化较之同一阶段其他类型的考古文化不仅在时间上是最早的，而且有较高的发展水平。首先，它的农业就是相当发达的。农业起源于采集，故最早的农业为采集农业。由采集农业转变为种植农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待人们掌握了农作物的生长知识后方能完成。种植农业最初是刀耕火种，即将树木砍倒连同灌木杂草一起烧光，掘洞点种，所以也叫砍倒烧光农业。这种原始农业很不稳定，常须流动换地而耕，故又称游耕农业。由此再向前发展，进入锄农业阶段，人们才能定居下来。这时人们已知道翻耕土地进行种植，收成相对来说有了保证，因而可以定期安居下来。所以，锄农业也可称为定居农业。到了发达的锄农业阶段，离文明社会就不远了。裴李岗文化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这从当时的遗址、遗迹和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中不难看出来。

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成批的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及磨棒。石斧器形规则，通体磨光，十分精致。石铲两端或一端呈弧形刃，一般长二十至三十厘米，宽十余厘米，局